王国维所编《罗振玉藏书目录》原本及罗王互赠藏书考*

黄仕忠　徐巧越

内容摘要：王国维于1916年初离开京都回国前，从罗振玉藏书之复本中挑选了部分书籍，并以所藏词曲作为回赠。王氏在1912年春曾为罗氏藏书编制目录，《王国维全集》认为日人稻叶岩吉钞本《罗振玉藏书目录》即为其本而予收录。今核其中集部词曲书籍，颇多出自王国维回赠之书，故知此目并非王氏所编定者。稻叶氏钞本系过录本，已失旧貌。今访得其底本犹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凡七册。其中二册题“宋元本之部”和“钞本之部”，应为王国维所编罗氏书目之“善本目录”；另五册则为罗氏所藏普通书籍，实据今题“大云精舍藏书目录”的稿本补充修订而成，此稿本才是王国维所编之原目。此本内，经、史两部之复本，多有被涂抹删去痕迹，这些被涂抹者，即是王氏挑选的复本。从所选书籍，亦可印证王国维学术转向情况。

关键词：王国维　罗振玉　《罗振玉藏书目录》《大云精舍藏书目录》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第二册，收录了《罗振玉藏书目录》三卷，卷首的解题说：

> 本书原名《罗氏藏书目录》、《罗氏振玉藏书目录》等，未署撰者，考为王国维作，约撰于一九一三年旅居日本时。书中颇多日本汉字，从而知系日本人抄录。因此书大半承袭另一部罗振玉藏书目录《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且书名明确，故改称《罗振玉藏书目录》，俾含义相近而醒目。原书每类后的统计数字，因藏书情况变化，与实际数目多不相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108）成果之一。

今悉仍其旧。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今即以为底本，并校以《大云精舍藏书目录》。[①]

可见编者是把辽图藏日人钞本《罗氏藏书目录》"考为王国维作"而予收录的。编者已经注意到此书"大半承袭另一部罗振玉藏书目录《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惜未对承袭原因加以关注。据笔者考察，这被承袭的"另一部罗振玉藏书目录"，才是由王国维编写的；辽图所藏日本钞本只是一个过录本，它的底本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京大藏本共七册，其中1913年入藏的两册善本书目，也是由王国维编定的。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京都大学合作将此目录影印出版，题名为《罗氏藏书目录》，刘玉才在弁言指出，此目录是"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最为全面完善的记录"。从三个目录之间的传承关系，不仅可以考察罗氏藏书目的变化过程，而且可以考见罗、王学术史的某些重要细节。今试述于后，亦以求正于方家。

一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解体。11月，王国维随罗振玉携眷流亡日本京都。他给缪荃孙的信里说，"维于十月中旬与唐风楼同东渡，现寓居京都市外田中村"[②]。陈鸿翔《王国维传》亦称，"王国维偕同罗氏及罗氏长婿刘季英，三家老少二十馀口，在凛冽的寒风中登上了日本'温州丸'商船，从天津大沽口启程，于十月初七日（西历11月27日）抵达神户"[③]。盖自神户上岸数日后，方抵达京都，时已中旬。

稍后，罗氏藏书运抵京都。因所赁住处狭窄，难以安顿，经协商，暂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同时亦供师生借阅[④]。王国维在京都期间，罗振玉聘其为助手，月薪二百元。整理罗氏藏书，为之编制书目，便是初到京都时的工作之一[⑤]。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说："叔翁在此现与维二人整理藏书，检点卷数。因此次装箱搬运错乱太甚，大约至明春二月方能就绪，目录亦可写定矣。"[⑥]此信写于公元1912年2月11日，前引解题以为"明春"即1913年春，遂定目录

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9年，第514页。

②《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37页。

③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

④如铃木虎雄说，"当时京都帝国大学里有罗叔言先生的寄放书籍，从中我也得益良多"（陈平原等编：《追忆王国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04页）。

⑤赵万里《民国王静安先生国维年谱》称："时罗先生藏书寄存京都大学，先生日往整理，因与彼邦诸文学教授相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页）

⑥《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39页。

编成于此时，实误。此信作于旧历辛亥年(1911)腊月廿四日，故“明春二月”，实是壬子年(1912)春二月(公历3月19日之后)。

罗氏之孙罗继祖在晚年回忆说：“祖父自己和王观堂亲将藏书整理一遍，由观堂编成《目录》四卷，《善本目录》一卷，这是藏书有目之始。后来在天津、在旅顺，藏书有增损，所增也以普通本为多但没有再编目。这部目录，由我保存，‘文革’中失去，已无法寻觅了。”[①]既然“没有再编目”，原本已失去，又未说另有过录本，意味着罗氏藏书目别无传存，所以辽宁图书馆所藏稻叶岩吉(1873-1940)抄本《罗振玉藏书目录》，便被视为王国维所撰，《全集》亦据以校录，作为王氏所编此目的唯一传本收录。

但仔细审核此目所收书籍，发现其中集部词曲类收录的书籍，大部分原为王国维所藏。

王国维旧藏词曲赠予罗氏，时间在旧历乙卯年底(1915)。王氏在旧历丙辰年正月初三(1916年2月5日)离开京都，赴上海担任《学术丛编》的编辑，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临行前，罗、王曾互赠书籍。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说：“公先予三年返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②]王国维则在离日赴沪的前一天，于日记里写道：

> 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馀。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官中无异，若至沪后，则借书綦难。海上藏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③]

罗振玉(韫公)考虑到王国维回国后看书不便，特将藏书中的复本赠与王氏。王国维则“以词曲书赠韫公”，以为回馈。赵万里所撰王氏年谱也说：“临行时，于海东书肆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等书，罗先生又贻以复本书如干种。先生亦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也。”[④]

王国维完成罗氏藏书目录的时间，是在1912年旧历春二月；至1916年春归国时，始“以词曲书赠韫公”，“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若《全集》所收《罗振玉藏书目录》确为王氏编定，那么其中就不应当收录王氏旧藏词曲。王国维旧藏的词曲书籍，现在大多藏于日本。原因是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罗振常

---

①罗继祖：《大云书库藏书、搜集、破坏、整理、归宿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第336页。

②罗继祖：《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③《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911页。

④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第102页。

将王氏所赠书籍，添加识语或浮签，公开出售。王国维的日本旧友纷纷认购，以作纪念；此外，公立单位如京都大学购得三种，私立文库如东洋文库购得25种113册，属于其中最大的一批。内藤湖南在所购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第四册上题识云："丁卯六月，王忠慤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从中可知罗振常出售这些书籍的目的与经过①。

据笔者查核，《罗振玉藏书目录》中的词曲书籍，其中一部分可与《静庵藏书目》相印证，另一部分则有王氏印章或题识、校语作证明。

王国维在1909年二、三月间，草编成《静庵藏书目》，附存于《人间词话》稿本。其中42种词籍，有35种与罗氏藏书目重合，仅7种未见；24种曲籍，有21种重合，仅《传奇汇考》精钞本十册、《董西厢》和《琵琶记》3种未见于此。这些重合的书籍，书名、卷数、册数、版本等信息基本相同。特别是，明抄本《曲品》、《元曲选》、明嘉靖刊《雍熙乐府》、明凌氏刊《西厢记》、明刊《玉茗堂刻昙花记》、抄本《西堂曲腋》及明钞《录鬼簿》过录本等7种，为王氏校录或批点跋语，可确定为同一书；还有明宣德刊《周宪王乐府三种》、明文林阁刊《传奇十种》、明刊《折桂记》、明刊《窃符记》、明刊《紫钗记》、明刊《南柯记》、抄本《财星照》、明刊《词林白雪》、抄本《明剧七种》、明刊《盛明杂剧初集》、影明尤贞起清初钞本《录鬼簿》及《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等12种，钤有"王国维"印的，也出现在《罗振玉藏书目录》中②。

后售归东洋文库的王国维抄、校词曲25种，罗振常在出售前，印有《海宁王静安（国维）手抄手校词曲目录》征订单一页。其五种戏曲，十九种词籍，亦载于《罗氏藏书目录》，仅王安石《半山老人歌曲》一卷（王国维抄录并跋）未见于罗氏藏书目。

此外，今据调查可知，尚有部分王国维的戏曲书籍为国内藏书家所购藏。郑振铎《西谛书目》著录的清宣统二年抄本《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三卷乃王国维旧藏，在罗氏藏书目录中亦可寻得踪迹。从王国维的书信可知，他曾将亲手题跋的《拜月记》给予刘世珩，而《暖红室汇刻传奇》中"拜月"一种所依据的即为王氏赠本。周越然言言斋旧藏中的《财星照》、《金锁记》、《上林春》、《翡翠园》、《金貂记》与金陵富春堂明刻本三种（《跃鲤记》、《双忠记》及《白兔记》），与张元济的《涵芬楼烬馀书目》中著录的康熙本范氏博山堂三种曲（《鸳鸯棒》、《花筵赚》及《梦花酣》），皆钤有"王国维"印章。不过，周氏藏三种富春

①黄仕忠：《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国学新视野》秋季号，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37-38页。

②详参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及《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

堂传奇与张氏藏博山堂三种曲虽都有王氏藏印，但都未见罗氏藏书目录收录，从何而得，俟考。

既然1912年春编成的罗氏藏书目录，不应收录王氏所藏曲籍，那么，这种“罗氏藏书目录”，显然不是王国维编撰的那一种。据笔者考察，罗氏藏书目录，另外尚存有两种，它们可以解答何者为王氏所编目录，罗氏藏书目录经过怎样的添改、抄录，以及王国维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复本”有哪些。

二

前引罗继祖晚年（1986）的回忆文字，谓王国维在抵东瀛之初，与罗振玉一起整理罗氏藏书，并编成《目录》四卷，《善本目录》一卷，可知王氏所编，实含普通书目录和“善本目录”两种。

1980年代，辽宁图书馆发现了日人稻叶岩吉氏过录本罗氏藏书目录，被认定是王国维所编。2003年，萧文立编《雪堂类稿》戊集《长物簿录》，即将其作为王国维著作收录，惟改题为“大云书库藏书目”，其跋文云：

> 两公遁居东瀛时，雪堂藏书寄存京都大学，乃俛观堂编目，即此本也，后稿存雪堂冢孙鲠安手，大连光复时与藏书俱星散。顷辽宁图书馆拟影印大云遗藏为《雪堂遗珍》，韩锡铎、王清原二君以海上吴格君之介，俛文立乞鲠翁圈目、作序并题首。王君并携馆藏此目复印本为赠，允文立编入《雪堂长物簿录》中。此本为日本学者稻叶岩吉过录本，伪满时赠伪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亦今日宇内孤本。文立以奉鲠翁，翁喜不自禁，曰此王先生所手编者也，失去凡若干年，今日幸得再睹，如再赡王先生芝宇矣，此实唯两公在天之灵以式凭之！即以《大云书库藏书目》名之，题数语以归文立。[①]

此书被视为“宇内孤本”，而冠以“大云书库藏书目”之名，则系罗继祖（鲠翁）所题；罗氏见到此书，认为“此王先生所手编者也”，所以萧跋说“雪堂藏书寄存京都大学，乃俛观堂编目，即此本也”。《王国维全集》卷二“解题”所称“考为王国维作”，实据此说，只是另定书名作“罗振玉藏书目录”。即书名虽异，内容则同。

但这所谓“宇内孤本”，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不仅它的底本尚可见到，而且王国维所编定的目录，也仍幸存于世。

稻叶氏所据之底本，现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封面题《罗氏藏书目录》，共七册。索书编号为4-49ヲ1，馆藏目录题著者为“罗振玉”，“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写（本）”，抄写时间定为1924；又因内文有改删，又标作“稿本”。此七册依今藏者之序次，为：经之部、史之部、子之部、集之部、宋元本之部、钞

①萧文立编：《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78-1079页。

本之部、丛之部。按,“丛之部”实应移于“集之部”之后。盖前半普通书目,后两种为善本书目。此钞本以往未为中国学者所知,或因为藏者所署编者为罗振玉,故此前尚未有人虑及它与王国维的关系,《王国维全集》的编者也未及援引。笔者在2015年赴日本访书时,偶见日本学者著作引用,才始予关注。

稻叶氏钞本原题《罗氏藏书目录》,共三册,上册为经、史二卷,中册为子、集、丛三卷,下册则为宋元本与钞本(此册扉页又作《罗氏振玉藏书目录》),包含了京大所藏七册的全部内容。较之京大藏本,已将“丛之部”移前;即前二册为普通书目,末册为善本书目。京大本间有校订涂删,稻叶本则页面整洁,文字同涂删后的京大藏本。可见稻叶氏据京大本抄录而成,不过,也泯去了其底本由两种本子缀合的痕迹。

京大所藏七册,书衣题签均作“罗氏藏书目录”,实含两种完成于不同时期的目录,两者题签字迹有异,并非同时抄录。各册之衬页题有“罗氏藏书目录　□之部　共七册”三行,字体笔迹完全相同,当是将不同时期的七册汇为一集时所题。细察此七册,其中“宋元本之部”和“钞本之部”二册,书衣题签笔迹相同,内文书法也相同,扉页题作“罗氏振玉藏书目录”,入馆登记时间为大正二年(1913)五月十日。而经、史、子、集、丛五册,书衣题签、内文笔迹一致,但与另二册相异,图书馆入藏时间为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五日。所以说,这两者原不属于同一种书。

大正二年入藏、别题《罗氏振玉藏书目录》的二册,用日本纸抄录,版心印“出町中井版”,半页十行,可知系在京都书写。但内文未见使用日文汉字,抄者应为中国人。第一册的书签为隶书题“罗氏藏书目录　宋元本之部”,内容细分为“宋元本书目”、“善本书目”,“评校本书目”三项,每一项各以经史子集为序著录;第二册的书签亦为隶书题“罗氏藏书目录　钞本之部”,卷端题“钞本书目”,内文以四部为序分类著录。此二册原未标卷次,实可视为一卷。参考前引罗继祖语,此二册应为一书,即王国维所编之“善本目录”。盖罗、王二人在1912年春编成此目,后遣人抄录一本(并非罗、王二人笔迹,抄者为何人,俟考),为京大图书馆收藏,时间在1913年五月之前。

昭和五年登记入藏的五册,则为另一部书,即《罗氏藏书目录》。其中经、史、子、集、丛各得一册,各册厚薄不一,各自迄止。所抄文字,间用日文汉字,如“图”作“図”,“龙”作“竜”,“珑”作“瓏”,“释”作“釈”等,可知为日本人抄写,当是京都大学图书馆方面遣人抄录。

其中第一册“经之部”的衬页背面,有日文题识,译成中文如下:“罗氏藏书目录　共七册　大正元、二年之交,罗振玉氏拟将其所藏图书寄存于我校,右为该批图书一度保管于本馆之际着手编制目录而誊写者。然未几,罗氏提出取消寄存,翌年即大正三年前后归还之。大正十三年初春,山鹿记。”

故这五册的誊写，在大正十三年(1924)初春之前。从“共七册”一语可知，这时新写的五册与大正二年五月十日入藏的二册，因为均属罗氏藏书目录，所以被合并成一书，被置于时任职于京大图书馆的山鹿氏的案头，而未及时入库。故其正式登记入库时间为1930年。又由于此册的语言被定为日文，似未入汉籍书库，所以亦未被编入该馆的汉籍目录，遂长期未为中国学者所知。

京大藏五册本书目，已经收录了王国维回赠罗氏的词曲，故应编成于1916年3月之后。在京都期间，罗氏藏书总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目录，应是在王国维与罗振玉共同编集的目录基础上，增加新得到的王氏藏书，同时删去已赠予王氏的复本而成。它的定稿者当是罗振玉，所以京大将编者署罗振玉是合适的。1913年入藏的那两册，虽然王国维参编了，但因为是由罗振玉付费请王氏所编，且罗振玉本人也参与了工作，所以归于罗氏名下，也在情理之中。而跋文的重点是罗氏藏书与京大的聚散因缘，“该批图书一度保管于本馆之际着手编制目录而誊写者”之语，只能管到先得的那两册，不能照应到后录的五册。又考罗振玉于1919年3月归国，故此目的抄成时间，应在1919年3月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编定的罗氏所藏普通书目录的稿本，其实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它就是《罗雪堂合集》(西泠印社，2005)里收录影印的《大云精舍藏书目录》。原书为稿本，现藏于大连图书馆，两册装，未题书名，因内有“大云精舍”印，故影印出版者代拟此一书名。此书上册为经、史二卷的目录，下册为子、集、丛三卷之目。内文批注删削涂改之处颇多，栏上还有朱笔圈注。罗氏《集蓼编》自述云：“予寓田中村一岁，书籍置大学，与忠悫往返整理甚劳，乃于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建楼四楹，丰以栖眷属，丰以祀先人、接宾友……寻增书仓一所，因箧中藏北朝初年写本《大云无想经》，颜之曰‘大云书库’……未几更语移存大学之书于库中。”[①]“大云精舍”是罗振玉常用的馆号印。最初所编目录似未定书名，赠予京大图书馆时，应如1913年入藏的两册“善本书目”所示，题作“罗氏振玉藏书目录”。即京大所藏两册“善本书目”和此种二册装“普通书目”，才是王国维所编的目录，它的原题应是“罗氏振玉藏书目录”。京大图书馆方面，后来重新抄录了罗氏重订本五册，为了让此种新目录能够完整反映罗氏藏书面貌，将1913年旧抄二册与1919年前后新抄的五册合缀为一书。稻叶氏后据此合缀本抄录。故准确地说，《王国维全集》第二卷所收者，只有“宋元本之部”和“钞本之部”属于王氏著述；王氏所编书目的另一部分，即是《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也即是罗继祖所言“文革”中散失的那一本。

从《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与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比较，可以看到罗氏藏书在京都时期的变迁情况。

①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41页。

一,《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收录的是罗氏所藏的普通书籍,因为“善本目录”已经另册编定。

二,《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所录五部的体例,与京大藏五册本“罗氏藏书目”完全相同,但“集部”未收“词曲类”书籍。这当是因为直到1913年元月《宋元戏曲史》定稿之前,王国维的主要精力都是为其戏曲研究作收尾工作,为方便王国维使用,罗氏的词曲类藏书也一直置于王氏案头,没有放到京大图书馆,所以也未编入目录。从中可见罗氏给予王国维的学术研究的尽力支持。也就是说,王、罗二人最初所编的,其实是寄存于京大图书馆的罗氏藏书目录,而不是所有罗氏藏书的目录。

三,参前引文献,“翌年”即大正三年(1914)前,罗氏已经“移存大学之书”于新建的大云书库。至1916年3月之前,赠送一部分复本给王国维,同时也得到了一批王国维的旧藏书,借给王氏使用的词曲书籍也已经收回,兼之在日期间新得了一些书籍(主要是日本刊本),罗氏藏书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需要对旧目加以修订。罗振玉遂在“大云精舍藏书目录”基础上作增订,以反映其实际藏书面貌。这便是京大藏五册本《罗氏藏书目录》的由来。再依罗继祖“没有再编目”之言,知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修订之后,罗振玉新添之藏书皆未被收录其中。因此,周越然与张济元购藏的那些未被罗氏目录所著录的曲类书籍,极有可能是罗振玉此后所得之书,罗家将其与王氏旧藏一并盖上“王国维”藏印出售,赚取资费以抚恤王氏家人。

四,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较《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书目有所增加和订正。以丛部的部分条目的比较列为表1:

表1　三种罗藏书目录部分“丛部”条目之对比

丛部部分著录书名	《大云精舍藏书目录》	京大藏《罗氏藏书目录》	稻叶本《罗氏藏书目录》
《经训堂丛书》	“十六本”	原作“十六本”,后涂改为“二十本”	“二十本”
《珠尘别录》	“珠尘别录”	原作“珠尘别录”,后涂改为“珠丛别录”	“珠丛别录”
《渐西精舍丛刻》	著录在《正觉楼丛书》之前	著录在《正觉楼丛书》之后	著录在《正觉楼丛书》之后
《岱南阁巾箱本丛书》	著录作“二十卷”	未著录“二十卷”	未著录“二十卷”
《江左三大家诗钞》	未著录此3条	此3条著录在《渔阳选七家诗》之后,《日本大藏经》之前	此3条著录在《渔阳选七家诗》之后,《日本大藏经》之前
《岭南三大家诗选》			
《国朝六家诗钞》			

（续表）

丛部部分著录书名	《大云精舍藏书目录》	京大藏 《罗氏藏书目录》	稻叶本 《罗氏藏书目录》
《粤十三家集》	未著录此6条	此6条著录在《渔阳选七家诗》之后，《日本大藏经》之前	此6条著录在《渔阳选七家诗》之后，《日本大藏经》之前
《钱唐四布衣诗集》			
《戴氏三俊集》			
《八家四六文注》			
《蒙香室丛书》			
《宋三大臣汇志》			

前三例可见其后出转精，对前一目录中存在的错误有所订正；第四例应为著录信息之漏抄；后九条则是新增入的内容，亦即补充1912年目录编成之后新得的书籍。由《经训堂丛书》与《珠尘别录》两条，可知京大藏《罗氏藏书目录》抄录后的改订，为稻叶钞本依样接受，亦可证稻叶本确据京大本抄录而成。此三种目录的编订抄录顺序应为：《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京大藏《罗氏藏书目录》→稻叶氏过录本《罗氏藏书目录》。其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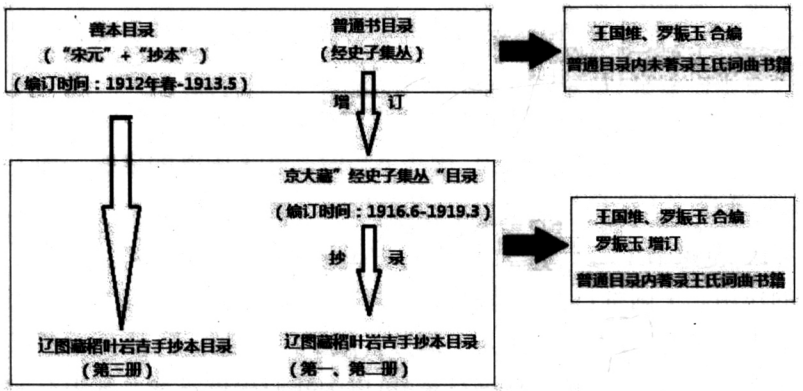

图1　罗振玉藏书目录的变迁过程

要之，未含王氏旧藏书籍的《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是王国维于1912年所编的罗氏藏书的普通书目录；京都大学所藏七册中的"宋元之本"和"钞本书目"二册，是王国维编定的"善本目录"。它们应署"王国维、罗振玉编"。至于京大藏《罗氏藏书目录》五册和稻叶氏抄本的前二册，实是罗振玉在旧编目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其修订完成时间应在1916年3月至1919年3月之间，著者应署"王国维、罗振玉合编，罗振玉增订"。

三

考查清楚王国维所编书目与罗氏所订补目录之变化过程，再将这不同阶

段编成的目录进行比对，不仅可以考察罗氏藏书的变化，更可考见大云书库藏书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被删之“又一部”考证罗氏于1916年所赠之具体书目与数量，从而探讨王氏学术转向后的研究重点。

表2为今存三部罗氏藏书目录中经史子集丛五部所著录之种数统计。

表2　三种罗氏藏书目录的著录数目对比

部类	大云精舍藏书目	京大本目录	稻叶岩吉过录本
经部	489	489	479
史部	1299	1230	1222
子部	525	560	560
集部	801	960	960
丛部	305	314	314
总数	3419	3553	3535

在1912年春由王国维编订目录时，罗振玉藏书（寄存于京都大学的普通书籍）共有3419种；而在1916年三月之后经过罗振玉增补的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增加至3553种；稻叶岩吉过录本《罗振玉藏书目录》因抄写产生的缺漏，较京大本少著录18种，这说明其抄录后疏于校对。三种目录在经、史、丛三部所著录之总数相差并不大，其差异主要存在于子、集二部。《大云精舍藏书目》的子部未著录“附录 译书类”，盖当时初到日本时，此类书尚未购置；另外集部无“词曲类”，则如前所说，这些书当时尚在王国维的案头。加上这二类194种典籍，《大云精舍藏书目录》的数据便与另外两种目录基本相符。

罗氏“割藏书十之一”赠予王国维，对王国维归国后的学术研究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王国维自称“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他究竟是得到了罗氏藏书中的全部“复本书”，还是一部分？是罗氏主动给予，还是王国维有目的地挑选？稿本《大云精舍藏书目录》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其中有大量原写作“又一部”而后被删涂之痕迹，而这些被删的复本，在京大本及稻叶过录本之《罗氏藏书目录》中均未著录。故除去个别因讹误、重复而被划去的情况，《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中被涂删的“又一部”，应该就是王国维从罗振玉处得到的“复本书”。

据笔者统计，这种涂去的“又一本”，经部共34种431卷，史部共52种1090卷，子部有8种91卷，集部有18种262卷，丛部有4种294卷，总计划掉了116种2168卷[①]。罗氏说“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大云书库号称有书五十

①经部尚有两部不分卷数与一部卷数不明，史部有两部未著录卷数信息，集部有一部不分卷数。故除统计的总数外，仍有六部著作因不分卷数与卷数不明的原因未纳入统计。

万卷，十之一即意味着五万卷之数。今以《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总共3419种书籍而推算，王国维所取者116种，不足百分之五。故罗氏之说，不无夸大之嫌。不排除罗氏目录之外，也有若干目录中未曾著录的赠书，但从此目中选录的比例来看，其数量不会太多。而王国维回赠的词曲书籍，至少为68种，总的种数虽少于从罗氏处获得者，但罗氏所予者不过是“复本书”，而王氏回赠者则是“善本词曲”，其中包括王氏本人的批校本和题跋本，自然也是想对罗氏的多方关照有所回馈。所以罗、王互赠书籍，并不是对等的，赵万里说“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也是实话。

王国维自称向罗振玉“乞得复本书”，但《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仍有不少“又一本”未被涂去，特别是集部书中的复本基本未作涂删，可见王国维并不是将罗氏藏书的所有复本都取走，而是根据自己实际的研究需要，有目的地挑选了一部分书籍。这个选书过程，即是用《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为依据，凡是王国维看中的书籍，从目录上涂去，另从书库中觅出。

王国维所挑选的书籍，以经史类为多，仅史部的卷数就占了总卷数的一半，而子、集、丛被挑选的书则较少，三部的总种数，尚不及经部。其中经部又以说文、字书与韵书等小学类书籍居多，史补、校注与地志类书籍的总部数则为史部之冠。集部及丛部被挑选的复本，也多是经学家（小学家）、史学家的文集，集部之书包括桂馥《晚学集》、严可均《铁桥漫稿》、沈涛《十经斋文集》、许瀚《攀古小庐文》、何秋涛《一镫精舍甲部稿》及刘文淇《青溪旧屋集》等，丛部中的毕沅《经训堂丛书》及顾炎武《亭林遗书》，内容皆涉及经史考据。

这些被划去的“又一部”书籍，与王国维回国后所展开的研究，正相对应。如王国维此后撰有《殷周制度论》、《仓颉篇残简跋》、《六朝人韵书分部说》、《韵学馀说》、《唐韵别本考》、《西域杂考》与《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这些研究与大云目中被挑选的《十三经注疏》、《仓颉篇》、《集韵》、《古今韵略》、《汉书西域传补注》、《元史氏族表》、《元史译文证补》与《元秘史李注补正》等有着明显的关联。

王国维在1913年之后，开始了学术转向。此后不再从事戏曲与词学的研究，也不再在这两个领域发表意见，所以他在1916年初将这类书籍全部送给了罗家。而他从罗家“乞得”的复本书，主要是经部小学类和史部的史地类，这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说明王氏的学术转向。这是稿本《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中可以发掘的价值之一。今后应将此稿作为王氏著作收录，只是收录时，要注意把涂去的“又一本”恢复回来，因为这才是王国维手定本的真实面貌。

【作者简介】黄仕忠，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徐巧越，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方向：域外汉籍、俗文学文献。